

纳粹德国的流亡历史学家：对民主制的种种政治态度

格奥格尔·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孙燕 译 宋立宏 校

我最初应邀做魏因曼演讲 (Weinmann Lecture) 时，主办人建议我讲纳粹时期的种种经历对流亡学者、尤其是对流亡的犹太学者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使他们像我一样加入到美国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的斗争中。但是我不得不让主办人失望了，因为流亡到这个国家的犹太学者极少遵循这条路径；而我自己的情况实非典型，因为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只有 11 岁，而且在这里接受了几乎全部的教育。所以我建议转而讨论这些学者在离开德国前对民主制抱有的种种态度，以及他们 1945 年以后在德国民主观的形成、在批判性地重新审视德国历史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他们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的话。概括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流亡学者。一类几乎都是由这种人组成的：他们的祖上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已经皈依了新教或者就出生在早已皈依新教的家中。¹ 他们中的有些人怀有敌视魏玛民主制的政治思想，有些甚至接近纳粹的意识形态，但这些人由于犹太血统而不得不离开德国。第二类由忠实的民主人士组成，这些人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而被迫离开的。后一类人中有的没有犹太血统，但大多数人皈依了新教或者脱离了犹太社团。我先从第一类谈起，而且只谈历史学家，因为我对他们了解得最多。

在美国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德国犹太人差不多被彻底同化了，他们已经与犹太宗教几乎完全决裂了。这种想法不太准确，尽管在中上等阶层中间，尤其是在德国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中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与中上等阶层不同，犹太生活在犹太中产阶级中仍然有活力。在中产阶级那里，仍然有犹太文化、社会和体育组织；犹太智力生活也依然活跃。20 世纪 20 年代，马丁·布伯和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在法兰克福创建的从事犹太研究的犹太学术院 (Jüdische Lehrhaus) 十分著名。当时还有许多犹太出版机构，例如犹太出版社 (Jüdische Verlag)、斐洛出版社 (Philo Verlag) 和朔肯出版社 (Schocken Verlag)。在 1933 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经颇具规模。事实上，犹太社团已分裂为两个阵营：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们出版周刊《犹太评论报》 [Jüdische Rundschau]) 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们成立的组织叫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协会)。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健身团体 (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为“马加比” [Makkabi]；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叫做“盾牌” [Schild] 体育俱乐部) 和青年团体。在纳粹掌权前，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相信，犹太人可以是优秀的德国人并因此被德国接纳；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只是幻想，他们呼吁建立犹太民族认同和犹太家园。

德国的犹太教信仰与东欧和北美的不同。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 (Moses Mendelssohn)

¹ 参看 George L. Mosse, *German Jews Beyond Juda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以及 George L. Mosse, *Germans and Jews: The Right, the Left, and the Search for a "Third Force" in Pre-Nazi Germany*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0), particularly ch. 4, "The Influence of the Volkish Idea on German Jewry," pp. 77-109.

开启的犹太启蒙运动于 18 世纪晚期在德国兴起。19 世纪初，自由主义运动寻求弥合传统正统观念和近代德国文化之间的隔阂。它简化了宗教仪式，不再偏重对仪式的遵从，并在保留希伯来语的同时将德语引入了礼拜仪式。19 世纪中期，反对自由主义的现代正统派出现，这是由法兰克福的参孙·拉斐尔·赫尔施 (Samson Raphael Hirsch) 拉比发起的。现代正统派坚持严格遵循犹太律法，但他们相信这和参与德国文化是可以相互结合的。传统犹太祈祷书是犹太宗教仪式之本，但布道用的是德语，而非意第绪语，即犹太式德语。较之美国的改革派犹太教，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在许多方面倒是与美国的保守派运动更加接近。孩提时，我就对我在美国看到的有关改革派犹太教的东西所震撼，我觉得改革派犹太教过于接近新教，所以很危险。我自己在汉堡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我父亲在法兰克福一个正统派家庭长大；我母亲出身于一个漠视宗教的家庭，尽管她祖父曾在汉堡重要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犹太会堂“圣殿”(Temple) 中担任领唱和司事 (Shames)。我父母设法走一条中间道路。在纳粹影响下，我成了一个非常守律法、同时又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尽管这两者在逻辑上不吻合。然而这种现象在我的犹太朋友中确实存在。我们梦想去巴勒斯坦，即我们所说的以色列地 (Eretz Israel)，加入那里的基布兹 (kibbutz)，从而脱离父辈们那呆板乏味的城市和资产阶级世界。到达美国后，这里的商业文化和我理想化的基布兹差别巨大，让我十分震惊。尽管我当时自视为正统派犹太人，但比起美国的正统派会众，我在当时定居的弗吉尼亚里士满的保守派会众中感到更自在。其间，美国一些正统派会众变得越来越接近保守派，而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已返回更为传统的观点和礼拜仪式。

从 19 世纪初开始，许多德国犹太人受洗成了新教徒。受洗意味着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受洗几乎不带情感意味。他们疏远了那种他们觉得属于中世纪的犹太教信仰，想要加入德国主流社会。诗人海因里希·海涅 (Heinrich Heine) 在学生时代就已皈依新教，时为 1825 年。他将受洗解释为“通往欧洲文化的门票”。² 至少在 19 世纪早期和中期，在宗教性质的反犹太教尚未让位给种族反犹太主义之前，皈依在职业上能带来大量益处。在更早的时候，皈依的犹太人已占据了德国学术生活的重要职位。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 (Friedrich Julius Stahl, 1802-1861) 成为官方保守的新教国家学说的主要倡导人。1813 年，约翰·奥古斯特·威廉·内安得 (Johann August Wilhelm Neander, 1789-1850) 在柏林被任命为新教神学教授，他皈依前的名字叫大卫·门德尔 (David Mendel)。实际上，犹太人不皈依的话，几乎不可能当上教授。数学系和医学系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任命没有皈依的犹太人，但这种情况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在人文学科中，在历史学中就更不用说了。1890 年，哈里·布雷斯勒 (Harry Bresslau) 成为首位被任命为历史教授的没有皈依的犹太人，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考虑让他担任柏林某个教授职位，但由于要求皈依被他拒绝了。不过他最终还是让他的孩子们受了洗。1876 年，赫尔曼·科恩 (Hermann Cohen) 成为第一位担任哲学教授的没有皈依的犹太人。科恩认同自由主义的、伦理的犹太教，他写道：现代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实际上已与新教建立了文化历史方面的联系。正如后者摆脱了教会的束缚那样，我们也摆脱了《塔木德》

² 德文原文是：“Der Taufzettel ist das Eintrittsbillet zur europäischen Kultur,” 见 Heinrich Heine, *Sämtliche Schriften*, ed. Klaus Briegleb (Munich: Hanser Verlag, 1976), 11: 622.

的束缚……并在所有精神问题上以新教的精神思考和感受”。³ 在魏玛共和国的一些自由主义影响更盛的新大学里，像法兰克福大学、汉堡大学和科隆大学，任职时的歧视逐步取缔了。

但是，做新教徒又意味着什么？德意志福音教会（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是德国新教教会在 1817 年后的正式名称，它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出现，深受马丁·路德神学理论的影响。该教会认为自己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精神，摆脱了陈旧的基要主义，稍后在 19 世纪又拥护现代科学。德意志福音教会众多有学识的倡导者认为，该教会是新教的现代文化形式（即“文化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这种现代新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密切认同德意志民族。然而，在德国并不存在诸如法国、英国、荷兰或美国意义上的革命。相反，国家统一运动是由新兴中产阶级和半专制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密切合作、共同参与的。在这种新民族主义思维中，路德神学理论的两个方面持续扮演着中心角色。首先，强调国家的核心地位和神圣特征。路德借用保罗在《罗马书》中的告诫：“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⁴ 服从君主取代了服从教会。教会成了国家的兵器。在民族主义时代，路德对保罗的借用被解读成德意志民族肩负着一项神圣使命，这一信念使得俾斯麦发动的旨在将德意志统一到普鲁士霸权下的战争合法化，同时也让德国在一战时的角色合法化。路德神学理论的第二部分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即他的反犹太教。在争取犹太人皈依的努力失败后，路德在他詈骂式的《犹太人及其谎言》（*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ügen*，此书后来被纳粹分子热捧，用来为他们迫害犹太人正名）中谴责犹太人，号召摧毁他们的会堂，并将他们根除。从 19 世纪德意志福音教会时代直到 20 世纪纳粹时代以后，犹太教不再是一个可以交流的宗教；犹太人更要集体为耶稣之死负责。他们获得拯救的唯一方式是皈依，尽管这个方法很快也失效了。随着解放了的犹太人登上较高的社会和教育阶梯，并逐渐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中担任重要角色，到 19 世纪 70 年代后，宗教性质的反犹太教转变成了种族反犹主义。那种视犹太人为中世纪陈腐之物的观念被取代，犹太人转而被当作现代性的一个先驱，这种现代性威胁了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农民，在文化上又威胁了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⁵ 这样一来，不仅没有皈依的犹太人受到歧视，具有犹太血统的任何人都受到歧视。种族反犹主义，而非歧视或迫害犹太人，最终导致德国新教教会在纳粹时期的分裂。纳粹分子试图建立一个德国新教教会，它排除一切犹太出身的人，并驱逐皈依的或来自皈依家庭的牧师。有鉴于此，认主教会（Confessional Church）在 1933 年成立，它反对纳粹把种族教条强加给教会。但是，只要不影响到它的成员，认主教会并不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政策。牧师马丁·尼慕勒（Martin Niemöller）后来被人们誉为英勇反抗纳粹的人，但他在 1935 年仍然在布道中声称犹太人理应遭受纳粹施予他们的苦难，因为只要不皈依真正的信仰，犹太人就要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负责。⁶

³ Georg G. Iggers, “Academic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1870-1933: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el Aviver 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27 (1998): 473-90.

⁴ Letter to Romans 13:1-2.

⁵ Shulamit Volkov, *The Rise of Popular Antimodernism in Germany: The Urban Master Artisans, 1873-189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⁶ 关于政治路德教、反犹主义和认主教会，参看 John Moses 最近完成的书稿：“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德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现代见解，但又墨守传统的权威意见（这也是文化新教的特征），认清这点对理解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职业的形成很重要。⁷ 在民族认同感的创建过程中，历史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于 19 世纪上半叶成为新教德国大学的一门专业学科。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意思是说，他们想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消除通往市场经济的陈旧障碍，结束封建的等级划分。在智力层面上，他们渴望自由地交流思想；在政治层面上则希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参与对国家的治理。历史学家在导致 1848 年革命爆发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革命旨在争取民族联邦制和君主立宪政体。在 1848 年革命中遭受的挫折使大多数历史学家转变立场，让他们反省广大中产阶级的观点。他们越来越相信，德国的统一不能通过来自下层的运动实现，而只能依靠与普鲁士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专制王朝结盟；不能依赖决议，而只能依赖——用俾斯麦的话来说——铁和血。与此同时，虑及法国的前车之鉴，他们担心出现革命，因而拒绝民主，试图在一个支持有产阶级的立宪制政府和一个能有效遏制革命动荡、能将德国建成世界大国的强有力王朝这两者之间寻求妥协，找到解决方案。在当时工业化快速发展、社会冲突相伴而生的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支持民主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它成为对既定秩序的主要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支持德国现状的人构想出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⁸ 来为德国参战辩护，来拥护德国的“1914 年理念”并反对西方协约国的“1789 年理念”。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包含这样一种信念，即德意志“文化”（*Kultur*）及其理想主义根基优于据说是理性主义和商业化的西方“文明”（*Zivilisation*）。这种见解还宣称，德国文化优于东方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以此证明德国扩张和德国统治东欧各民族是正当的。这样，新教的国家学说使德国的参战理由有了宗教合理性。

在这些讨论中，历史学家起了关键作用。⁹ 1848 年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历史职业集中探讨国家，把这个国家就确定为普鲁士霍亨索伦君主国，并视 1871 年（由俾斯麦领导的、排除了天主教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统一为德国历史的顶峰。这种见解在呈现德国现代化道路方面取得了正统地位；德国走的这条道路显示，维持一个满足中产阶级诸多经济和社会愿望的半专制政权，是一个比建立西方民主制更优越的选择。这种见解的正统地位并没有随着 1918 年霍亨索伦王朝的崩溃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结束。相反，德国大学里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反对共和国及其代表的民主制，继续墨守正统的德国历史观，并主张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必要时则可诉诸军事手段。

God's German Lutheran Revolutionary”；关于尼慕勒的布道，Moses 引用的是 Eberhard Röhm 和 Jörg Thierfelder, *Juden-Christen-Deutsche, 1935-1938*, vol.2, part 1 (Stuttgart: Calwer, 1992), p. 68.

⁷ 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译本参看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⁸ 参看 Bernd Faulenbach, *Ideologie des deutschen Weges: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Historiographie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Beck, 1980).

⁹ Iggers,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现在，那些最终被纳粹驱逐出境的历史学家又持什么样的观点？¹⁰ 我们能在有犹太血统的学者中做出什么划分，就能在没有犹太血统的、纳粹术语所谓的雅利安历史学家中做出类似的、密切对应的划分。在这些人中，有的激烈反对共和国，拒绝与强加给德国《凡尔赛条约》的西方国家和解。这个群体怀有一种重要的不实信念：德国 1918 年在前线并未被打败，而是被德国内部一伙人从背后刺了一刀；这些人在战争期间要求民主改革，反对德国的战争目标，从而扰乱了德国在 1914 年进入战争前所拥有的民族和谐。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通常还有犹太人被认为是这类罪犯。汉斯·菲尔德 (Hans Herzfeld) 在 1928 年的一本书¹¹ 中从学术上认可了这一指控，然而他没有提到犹太人。菲尔德的祖父母中有一位是犹太人，所以他属于纳粹定义的犹太人，但他没有移居国外，并在纳粹德国成功幸存下来。格哈德·马苏尔 (Gerhard Masur) 和迪特里希·格哈德 (Dietrich Gerhard) 这两位流亡历史学家青年时就于 1919 年加入“自由军团”(Freikorps)，这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原始法西斯民兵组织。但是，格哈德没几年就转向更为民主的立场。

不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右翼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中出现了代际分歧。在大学里功成名就的老一辈遭到年轻历史学家的批判，这些年轻历史学家反对前辈们狭隘的、以政治为导向的历史观，渴望书写一种涉及广大群众多方面生活的新历史。他们不从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这一角度来理解德国民众，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机的社群 (organic community)，该社群不知道什么社会分工，而只代表一个国族 (ethnic nation)，即一个根据种族 (race) 定义的德意志“民族”(Volk)。¹² 在这个社群中，犹太人没有一席之地，非德意志人也没有。这些年轻历史学家鼓吹以“民族”为导向的历史，呼吁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把世界理解成与其他族群的生死战斗。为了取代俾斯麦所锻造的德国，他们预见了一个大德国 (Greater Germany)，它将不仅囊括奥地利，还包括德国边境上和边境外的所有德裔定居点，尤其是东欧的德裔定居点。他们相信，德国种族的优越文化赋予他们权利和义务去统治东部的非德意志地域。除这一运动外，还有一个成员不同的团体，即以诗人斯特凡·乔治 (Stefan George) 为中心的精英知识分子圈子。斯特凡·乔治蔑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认为这是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他呼唤一场新的精神觉醒，以摆脱理性主义见解，这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是当今世界的特征。尽管斯特凡·乔治心怀反犹主义，但他身边仍然围绕着一群有犹太血统的崇拜者，其中包括文学学者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 (Friedrich Gundolf)，以及当时还年轻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贝尔内 (Arnold Berney) 和恩斯特·坎托罗维奇 (Ernst Kantorowicz)。贝尔内一方面因袭了普鲁士历史的正统路线，后来写出一部腓特烈大帝的传记，把他描绘成圣徒，以此期望自己就算拥有犹太出身也能在学术生涯上获得成功。但在 1923 年希特勒暴动

¹⁰ 参看 Wolfgang J. Mommsen, “Germ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the Émigré Historians,” in *An Interrupted Past: German-Speaking Refuge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33*, eds. Hartmut Lehmann and James J. Shee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2-66.

¹¹ Hans Herzfeld,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Auflösung der nationalen Einheitsfront im Weltkrieg*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28).

¹² Willi Oberkrome, *Volksgeschichte: Methodische Innovation und völkische Ideologisier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18-194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3).

时，他又赞赏纳粹分子，认为他们能够医治德国社会的种种疾病。贝尔内没有放弃对纳粹的赞赏，但在日记中失望地指出“我突然发现，(对纳粹来说)我是一个犹太人。”¹³ 1933年后，他没有移民美国，而是发现了自己的犹太民族认同，去了巴勒斯坦。坎托罗维奇本着斯特凡·乔治的气质，于1927年¹⁴出版了一部有关13世纪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历史书，他在书中刻意回避脚注，挑战学术常规，构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领导人一朝一日拯救德国人民的神话。纳粹的“卐”字标记出现在书的封面上。据说希特勒十分欣赏此书，读了两遍。尽管坎托罗维奇具有犹太血统，这本书仍然在纳粹统治下再版。坎托罗维奇后来移民美国，在那里修正了态度，转向了民主。

但在移民美国的历史学家中，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在1933年以后与纳粹交往最密切。他在流亡历史学家中间可以说独一无二，因为在他长大的那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是没有皈依的犹太人。他的父亲甚至一度是卡塞尔(Kassel)犹太社团的领导人。罗特费尔斯在上大学时皈依，成了热情的民族主义者。1926年，年纪尚轻的他就成为东普鲁士柯尼希山(Königsberg)大学的全职历史教授，在那里培养了许多最有前途的年轻历史学家，他们都奉行以“民族”为导向的历史。1939年后，他两个最重要的学生西奥多·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和韦尔那·康策(Werner Conze)建议纳粹政府制定计划驱逐波兰人，为德国定居者腾出空间，并消除东欧的犹太人。罗特费尔斯偏离了德国作为俾斯麦式国家的正统立场，转而拥护一个扩大的德国——在这个国家里东欧将按照新的民族政策来组织，并由他所认为的文化上优越的德国人统治。然而，在1934年，他因为自身的犹太血统而被解除教授职位，被安置到柏林一个不明确的职位上。这次解职在纳粹党内部遇到反对，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柯尼希山的重要作用促成了德国在东部的野心，更因为他与海外有影响力的右翼人士、特别是与那些对纳粹德国友好的人士有国际交往。后来担任纳粹外交部长的约阿希姆·里宾特洛普(Joachim Ribbentrop)，为了罗特费尔斯亲自与希特勒斡旋。罗特费尔斯做了两次尝试，希望自己能被承认为名誉雅利安人，均以失败告终。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成为唯一一位受过割礼的纳粹历史学家。1939年8月战争爆发前夕，他最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他当时仍然希望能在纳粹德国获得安置。1946年他收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任命。¹⁵

¹³ Michael Matthiesen, *Verlorene Identität: Der Historiker Arnold Berney und seine Freiburger Kollegen, 1923-1938*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8).

¹⁴ Ernst Kantorowicz,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 (Berlin: G. Bondi, 1927); Robert E Lerner, "Ernst Kantorowicz and Thomas E. Mommsen," in *Interrupted Past*, pp. 188-205.

¹⁵ 有关罗特费尔斯与纳粹的密切联系，以及他的学生韦尔那·康策和西奥多·席德尔在纳粹统治下的作用，参看 Ingo Haar, *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der "Volkstumskampf" im Ost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esp. "Hans Rothfels und seine Schüler," pp. 70-105; 以及 Karl Roth, "Richtung halten": Hans Rothfels and Neo-Conservative Historiograph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in *German Scholars and Ethnic Cleansing, 1919-1945*, eds. Ingo Haar and Michael Fahlbusch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pp. 236-59; 关于康策、席德尔和种族清洗，参看 Ingo Haar, "German Ostforschung and Anti-Semitism," in *German Scholars*, pp. 13-15; 另参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oder Geschichtsklitterung? Ingo Haar und Hans Rothfels. Eine Erwiderung,"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0 (2002): 635-52. 关于罗特费尔斯最新、最全面的著作是 Jan Eckel, *Hans Rothfels: Eine intellektuelle Biographie im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5).

也有少数历史学家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在职业圈中只占据边缘地位。他们拒绝那种把俾斯麦半专制国家视为历史顶点的正统观点，相反，他们试图把历史视野从狭隘的聚焦政治拓展到关注社会因素。1933 年以后，所有具有民主取向的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些非犹太人，统统逃离了德国，绝大部分前往美国。老一辈人包括非犹太人法伊特·瓦伦丁 (Veit Valentin)，他曾从批判的民主角度重写德国历史，¹⁶ 于 1917 年被剥夺了在大学任教的权力。阿尔弗雷德·瓦茨 (Alfred Vagts) 也不是犹太人，他论述过经济利益团体对德国外交政策的作用。阿瑟·罗森贝格 (Arthur Rosenberg)¹⁷ 是马克思主义者，是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共产党在魏玛共和国 (Weimar Republic) 国民议会中的重要发言人，但一旦德共屈从于斯大林，他就脱离了该党；他写了一本论述魏玛共和国起源的历史，其中指出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罗森贝格有犹太血统，从小受洗成为新教徒，但成年后离开了教会。作为公开的无神论者，他从不加入犹太社团，但在反犹主义的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犹太认同，后来甚至成了一名左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黑德维希·欣策 (Hedwig Hintze)¹⁸ 致力于探索一个基本上属于禁忌的话题：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方面。她是有犹太血统的受过洗的新教徒，同时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奥托·欣策 (Otto Hintze) 的妻子。奥托·欣策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已偏离早期的普鲁士取向，转而用比较方法研究社会史，这让他能对现代社会中的国家特点重新做出清醒的评价。黑德维希·欣策被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聘为教授，但未能获准进入美国。1942 年在流亡荷兰期间，她在即将遭到驱逐时死去。¹⁹

一群较年轻的、严谨的社会史学家聚集在柏林大学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 召集的研讨会上。在这群人中，几乎所有参与者起码都有部分犹太血统，但除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恩斯特·西蒙 (Ernst Simon) 外，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迈内克坚定地奉行正统的普鲁士路线，但在两个重要方面又与之有所不同：他不再狭隘地集中探讨政治，而是关注政治思想所造成的影响。虽然他出于爱国主义情感是 1914 年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但他与包括马克斯·韦伯和恩斯特·特勒奇 (Ernst Troeltsch) 在内的一小群知识分子一起，很快就极力主张温和路线，并在 1918 年 11 月后支持魏玛共和国。尽管他内心仍然拥护君主制，但对现实的认识使他接受魏玛共和国。他也宽容其他异

¹⁶ 参看 Veit Valentin, *1848: Chapters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40); 关于 Veit Valentin, 参看 Hans Schleier, *Die bürgerlich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5), pp. 346-98.

¹⁷ 最新的著作参看 Mario Kessler, *Arthur Rosenberg: Ein Historiker im Zeitalter der Katastrophen (1889-1943)* (Cologne: Böhlau, 2003).

¹⁸ 参看 Schleier, *Bürgerlich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Hedwig Hintze," pp. 272-301; Steffen Kaudelka, *Rezeption im Zeitalter der Konfrontation: Französ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1920-194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esp. ch. 3, "Wissenschaftlicher Fortschritt und demokratische Perspektive: Das Werk Hedwig Hintze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p. 214-408.

¹⁹ Peter Th. Walther, "Werkstattbericht: Hedwig Hintze in den Niederlanden 1939-1942," in "... immer im Forschen Bleiben": *Rüdiger vom Bruch zum 60. Geburtstag*, eds. Marc Schalenberg and Peter Th. Walther (Stuttgart: Steiner, 2004), pp.415-33.

见。在大多数同行强烈反对民主，并心怀反犹主义偏见（迈内克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偏见）的学术氛围中，他仍然愿意和那些与他意见相佐的年轻学者共事。因此，在他的年轻学生中间，既有政治上忠于民主的人，也有方法论上不仅不同于正统的普鲁士对国家的关注、而且不同于迈内克对政治思想的强调，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影响的一群人。有三个名字应该特别提及：犹太血统的新教徒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以及两位非犹太人埃卡特·克尔（Eckart Kehr）和豪约·霍尔本（Hajo Holborn），霍尔本的妻子是犹太人。尽管霍尔本是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但却是这群人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教授职位的人，供职于新建的政治科学大学（Hochschule für Politik）。克尔的说话行事无所忌讳，²⁰ 他对德国政治和史学传统的批评是这群人中最激进的。尽管遭到企图阻止他职业生涯的德国教授会成员的阻挠，他还是获得了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的奖学金。1933年5月，他抵达美国后不久便不幸去世。在纳粹掌权后，该群体的所有成员，包括我已经提到的迪特里希·格哈德和格哈德·马苏尔，因为政治原因或者犹太血统，或二者兼而有之，被迫离开德国。因此，新一代主张创新的学者被驱逐，留下传统历史学家独霸德国的历史职业。尽管传统历史学家通常不是纳粹党徒，但他们与纳粹相处得甚为融洽，并在很多情况下与之合作。在美国，流亡的年轻学者对研究近现代德国历史、对探讨纳粹怎样上台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三位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汉斯·巴龙（Hans Baron，是前面提到的恩斯特·特勒奇的学生）、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和奥斯卡·特里斯特莱（Oscar Kristeller）对美国文艺复兴研究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绝大多数移民在美国重新开始职业是很困难的，虽说也有一些例外。霍尔本很快从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提升到一个捐赠的讲座职位上。罗特费尔斯放弃布朗大学微薄的薪水，前往芝加哥大学。费利克斯·吉尔伯特从布林玛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转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阿瑟·罗森贝格直到1943年早逝，一直任教于布鲁克林学院。汉斯·罗森贝格也曾任职布鲁克林学院，但最终去了伯克利。迪特里希·格哈德去了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格哈德·马苏尔最初在委内瑞拉工作，后来去了斯威特布莱尔学院（Sweet Briar College）。乔治·哈尔高顿（George W. H. Hallgarten）就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写过一个重要分析，²¹ 但没有找到永久职位，这很可能是由他非常难处的性格和他的政治观点造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设立特别办事处，讨论如何处置战后德国，在这一过程中才出现了决定性的突破。1942年，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中设立了“外籍部”（Foreign Nationalities Branch），²² 其中

²⁰ 参看Hans-Ulrich Wehler为Eckart Kehr的论文集所写的传记性导言：*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erlin: de Gruyter, 1965); 另参Schleier, *Bürgerlich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pp. 483-530.

²¹ George W. F. Hallgarten, *Vorkriegsimperialismus: Die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Aussenpolitik europäischer Grossmächte bis 1914* (Paris: Éditions Météore, 1935); 关于Hallgarten, 参看Schleier, *Bürgerlich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pp. 482-530.

²² Barry M. Katz, "German Historian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in *Interrupted Past*, pp.136-39.

又有处理中欧事务的专门机构。最重要的美国专家，例如威廉·伦格 (William Langer)、H·斯图尔特·休斯 (H. Stuart Hughes)、卡尔·休斯克 (Carl Schorske)、富兰克林·福特 (Franklin Ford)、尤金·安德森 (Eugene Anderson)、瓦尔特·多恩 (Walter Dorn)、戈登·克雷格 (Gordon Craig) 和莱昂纳德·克里格 (Leonard Krieger) 定期会晤包括豪约·霍尔本、费利克斯·吉尔贝特、社会理论家弗朗茨·诺依曼 (Franz Neumann)、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和奥托·基希海默 (Otto Kirchheimer) 等在内的德国移民学者。马尔库塞和基希海默与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所——即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交往，该学派由同样移民美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和特奥多尔·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领导。诺依曼刚刚出版了《巨兽》 (*Behemoth*)²³，此书是第一本在分析纳粹主义的崛起时考虑经济利益影响的重要著作。对当局者而言，关键在于：纳粹主义是怎样掌握政权、实施其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计划的，在展望将来时，又应当如何为一个民主制德国奠定基础。尽管这些学者中没有一人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但他们相信纳粹的根源在于德国未能把俾斯麦领导的民族统一与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就为德国研究确定了基础，自此以后，美国学者和德国移民学者之间有了紧密合作。豪约·霍尔本在耶鲁培养了一代年轻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但也有青年移民，这些人后来占据了个国家德国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席位。

一些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流亡到美国、并在这里接受大部分教育的人也转向德国研究，同样提出了错在哪里这样的问题。²⁴ 这些人的工作较少关注社会经济因素，而更多地关注 18 世纪以来对德国政治和社会造成影响的观念和思想。乔治·莫斯 (George Mosse)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危机》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和其他著作中追溯了从德国政治浪漫主义者到纳粹党的种族 (*völkisch*) 思想，并在其晚期著作中把它与性别观念和男性中心论联系起来。弗里茨·斯特恩 (Fritz Stern) 在《文化绝望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一书中分析了为纳粹革命奠定道路的三位理论家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彼得·盖伊 (Peter Gay) 研究了从斯特凡·乔治到心理分析的极为广泛的德国文化领域，而没有局限于研究极右派。我的《德国的历史观》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不是研究极右派的文化革命，而是研究 19 世纪初以来的主流学术集团的反自由主义，这种反自由主义虽说没有直接导致纳粹，但却形成了一种见解，它使纳粹容易为德国学术界接受。在这一代人中有必要提及两位奥地利人，分别是社会批判角度论述女权主义历史的先驱人物格尔达·莱纳 (Gerda Lerner) 和从心理分析角度研究纳粹屠犹的乔治·克任 (George Kren)。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1945 年以后的德国，说具体点就是西德。²⁵ 随着能创新的历史学家的离开，保守派明显占据垄断地位。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被抛弃，事实上成了禁忌。

²³ Franz L.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Toron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²⁴ 关于这一代人，参看 Heinz Wolf, *Deutsch-jüdische Emigrationshistoriker in den USA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Bern: P. Lang, 1988); Walter Laqueur, *Generation Exodus: The Fate of Young Jewish Refugees from Nazi Germany* (Hanover, NH: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1).

²⁵ Winfried Schulz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 (Munich: Oldenbourg, 1989); Georg G. Iggers, "Nachwort zur deutschen Auflage von 1997,"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e Kritik der traditionellen Geschichtsauffassung von Herder bis zur Gegenwart*, 4th edition (Vienna: Böhlau, 1997), pp. 400-43.

然而，即使在纳粹主义失败后，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认为，俾斯麦解决德国问题所用的半专制主义方式——这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秩序——是德国历史的积极成果。几乎没有人认为这要为纳粹主义负责。在移民美国的历史学家当中，只有汉斯·罗特费尔斯返回德国永久定居，其他人也没有特别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与纳粹政权沾染很深的历史学家在多数情况下迅速重获了职业上的新生。罗特费尔斯作为政治知识分子、杜宾根大学教授和新成立的当代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在西德发挥了重要作用。²⁶ 他在《德国反对希特勒》(*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²⁷ 一书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当时被广为接受。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真正反对希特勒的，是参与 1944 年 7 月 20 日暗杀阴谋的军人和贵族。他论证了纳粹主义是一个植根于法国大革命的欧洲现象，而不仅仅见于德国。纳粹主义能在德国出现，不是因为德国没有民主，而是因为魏玛共和国太民主了，以至于允许民众让纳粹掌握政权。在战后二十年期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不关注纳粹犯下的罪行，而把德国人看成爆炸和驱逐的受害者。罗特费尔斯和上面提到的席德尔编辑了多卷本的德国人被驱逐出东欧的档案，该项目由西德政府赞助。²⁸ 这些驱逐确实构成人道犯罪，理应记载下来，但是该档案集却没有充分关注德国人此前犯下的罪行。

1945 年以后，席德尔和康策成为青年历史学生的最重要的两名导师。近期的学术研究使我们得知，这两人是与纳粹种族清洗计划沾染很深的历史学家，²⁹ 这在当时基本上不为人知。他们回避了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语言，但仍然主张他们早先历史观的基本要素。正如已经提到的，他们抛弃了正统历史学家以政治为中心的狭隘观点，而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史，他们还丢弃了对“民族”(*Volk*) 的关注和对中世纪农业世界的向往。相反，他们聚焦近现代工业社会。康策建立了影响很大的“近现代社会史工作区”(*Working Circle for Modern Social History*)，许多年轻而严谨的历史学家在此工作。但是，与许多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相同、而与他们的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康策和席德尔认为纳粹主义是近现代社会的固有成分，而与德国历史没什么渊源。

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战后培养出的新一代历史学家智力已经成熟，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1961 年，曾在纳粹历史机构工作的弗里茨·费舍尔 (*Fritz Fischer*) 出版了一部关于德国对一战负责的著作，题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³⁰ 此书在德国引起的反应像炸弹一样。费舍尔以档案证据为基础，得出结论，认为德意志帝国政府要直接为 1914 年战争的爆发负责，从而驳斥了在德国流行的战争是同盟体系崩溃的结果、所以各方责任均等的观点。他进一步主张，参战的决定还与德国在

²⁶ Peter Th. Walther, "Hans Rothfels im amerikanischen Exil," in *Hans Rothfel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 eds. Johannes Hürter and Hans Woller (Munich: Oldenbourg, 2005), pp. 83-96.

²⁷ Hans Rothfels, *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 An Appraisal* (Hinsdale, IL: H. Regnery Co., 1948).

²⁸ *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 (Bonn: 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 Refugees, and War Victims, 1953).

²⁹ 参看 Haar and Fahlbusch, *German Scholars*.

³⁰ 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之前在德国发表的德文版是: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 (Düsseldorf: Droste, 1961).

工业化时代不充分的民主结构有关。他认为，发动战争是企图逃避内部冲突，并阻碍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会威胁到现状。与此同时，他又记录了政府（在经济利益集团的压迫下）大规模扩张领土的计划，该计划是纳粹扩张领土政策的前兆。

20世纪3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历史学家没有受到费舍尔的影响，他们是在战后接受的教育，但他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与其导师康策和席德尔大为不同。他们回到被迫移民的、魏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持的对德国历史的批判。战后，汉斯·罗森贝格立即在德国主持了几次研讨会，将要在重塑西德历史意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青年历史学家参加了会议。就在持正统立场的历史学家为德国背离西方民主化进程而欢呼之际，年轻历史学家，例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A. Ritter，别把此人与老一辈的保守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混淆）和于尔根·科克（Jürgen Kocka）则寻求使德国沿着具有社会意识的现代民主制方向前进。他们离开旧学派的反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转向移民历史学家实践的批判的历史社会科学，转向一个开放的世界。必须指出，几乎所有年轻的历史学家都在美国和英国呆过很长时间，他们与当地的社会科学家和幸存的流亡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

因此，历史学家的政治见解是变化的。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德国的历史职业在学术界受到高度尊重，但是一般说来，德国历史学家很少有兴趣或者关心国外的历史研究。第一次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的是西德历史学家。西德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纳粹如何有可能建立恐怖统治，以及运用社会分析方法探讨德国19世纪以来的发展错在哪里。流亡学者的著作对这一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公开的历史学家的论战³¹表明，令人不无惊奇的是，有些人在唱反调，试图将德国对纳粹犯下的罪行所承担的责任最小化，但这些人只占很小一部分。曾有人预言，德国1990年的重新统一会导致民族主义情感再度伸张。这个预言并不准。历史学家还有媒体——尤其是电视³²——继续让公众面对德国的过去。德国的教科书广泛地、开诚布公地论述这段历史，所以德国的学龄儿童对纳粹屠犹有着充分的意识，这种局面在战后初期是看不见的。此外，犹太人对纳粹上台前的德国文化的贡献以及他们遭摧毁的丰富遗产都获得了广泛关注。因此，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魏玛时期流亡知识分子的工作尚未付诸东流。

³¹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unich: R. Piper, 1987).

³² Wulf Kansteiner, *In Pursuit of German Memory: History, Television, and Politics after Auschwitz*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